鄉村往事　　如雪攝

商業化

楊繼成

域外漫筆

三十年前我初到美國，暫住在親戚家裡看電視時，看到電視上有這麼多的廣告，抱怨浪費很多時間。那時國內的電視台沒有什麼廣告。親戚說，電視就靠這些廣告存活的，就權當「買票」吧。我初來時自己沒有電視機，也不看電視——反正也聽不懂。但有個專播古典音樂的廣播電台，絕對沒有廣告。打工、上課回家，專聽這個台，眞是個清靜場所。

其後，有十年時間住在香港，可以看到內地的電視台，似乎廣告仍不多。十餘年前，從香港辭職回美國家中，老伴已經爲我安裝了能接收鳳凰等電視台的衛星天線，我們先選定想看的節目，錄下來，待有閒時看。此時，隨着商業化的發展，廣告漸多。好在回放錄像的時候，遇到廣告，立即「快進」。自此，即使看本地電視台的節目，也必先錄像，過後再看。電視上廣告多，陪不起、躲得起。

當然，誰都會想逃避廣告。花錢做廣告的和拿錢接受廣告的，也都不傻、本事見長。例如北京台的保健節目中，會播出對參加攝製節目者贈送某一種乳品，那當然是做的廣告；此外，還會插進一行廣告語。我就想，我們看節目，總得有人買單，耳目不清淨，也沒啥。反正是逃不過去啦，權當買票。

廣告隨着商品化，逐漸鋪天蓋地。鳳凰網最頂上一排，全是學校的廣告，北大、交大都堂而皇之列名在上。依老朽看來，頗有點「斯文掃地」了。

在男人居優勢的社會中，女人的身體會成爲一種商品。猶憶青年女子的旗袍，把叉開到大腿根上的，解放前在上海只有妓女才這樣穿；初解放時在上海商業區的一家專供「白領」午餐的飯店，女招待開始這樣穿，也算一種附帶的「招待」吧。近年看到電視劇中，扮演出身顯赫、頗有社會地位的女士者，居然也這樣穿，我仔細注意，無一例外。蓋編導者確實看到當今社會，青年婦女越來越把自己的肉體當作商品，習以爲常，於是推想到「自古已然」，抹黑了先人，也反映出這些「文化人」的無知。

有「商品化」，必然會把藝術也作爲商品，遂有「包裝」、「炒作」。始作俑者，當然不是我們中國人。如今，許多中國演員都在自覺地成爲商品。有一位很有才華的演奏家，看得出來是在經紀人的指導下，努力「包裝」自己。髮式新型、奇裝異服、演奏時誇張的舉止，盡力嘩衆取寵，使我這個老頭，覺得很可悲。一個人的精力有限，如果不把全部精力投在藝術上，那就可惜了天賦和師長的培養。

美國的公共廣播公司（PBS），是一家非營利機構，由企業或公衆捐款經營，內容嚴肅、長人見聞；沒有廣告，也是我們喜歡看它的原因之一。但是，每當有一個很好的節目時，他們會用不少時間插進募捐的內容，惹人厭煩。老伴對我的埋怨不以爲然，說我們自己不捐錢，就不應該埋怨。這種情況似乎逐年在「惡化」，反映美國的經濟在走下坡路。

本文第一段提到美國的專播古典音樂的電台，在我們這個邊陲小城設有分台，起先也沒有廣告。近來已打破了這一慣例，開始有了廣告。蓋亦經濟形勢所發出的信號。

懷念魯平

廖書蘭

蘭窗新語

從五月四日一大早開始，香港各大報章皆刊登了這則消息：魯平於二〇一五年五月三日十九時二十分，因癌病在北京醫院去世。魯平是香港回歸過程中擔當與英國人談判的重任，同時又是負責香港回歸工作最久的一位京官。魯平溘然離世，但他爲香港歷史書寫的莊重一頁，香港人不會忘記！魯平與香港有着千絲萬縷密不可分的感情，這由他即使回京頤養天年，仍然天天閱讀香港報章雜誌，時時刻刻關心香港可見一斑。這些天來不少人發表了對魯平的追思緬懷文章，談了一些與魯平先生的交往。而我在這裡想說的是，魯平對新界歷史由來認識的豐富，對新界原居民身份的尊重，對與劉皇發一段交往的重視。

筆者於去年六月初赴京探訪魯平，他的屋子裡最大的特色是擺放着很多西洋古典音樂的唱碟和書籍。魯平精神矍爍，目光有神，談到新界歷史，他滔滔不絕，說到劉皇發在基本法起草時的堅定態度，魯平更是十分欣賞和佩服。

以下是魯平侃侃而談香港新界的歷史和對劉皇發的認識：

香港島和九龍半島是割讓給英國的，而新界是租借予英國九十九年。這是英國政府強加於滿清政府的不平等條約，中國人民從來就不承認。但對英國政府來說有個現實的問題：即到了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租期屆滿時，新界的土地究竟能不能繼續批出？有關新界的地契能否超越一九九七？英國人着急，主動來找中國談。麥理浩總督要求中國就有關新界的地契，希望可以超過一九九七，從而中英談判就此開始。中英雙方談判時，中方對新界事務不熟悉，劉皇發代表新界，我們專門請教了他，劉皇發給了很多幫忙。

對於英方的要求，中方當然拒絕，凡涉及國家主權的問題，肯定不同意，同意了便等同把新界的租期繼續延長；照道理，不平等條約到了期，就應該把新界還給中國，不單只是收回新界，事實上，英國把新界交還之後，香港島和九龍半島不可能維持下去，因為鐵路、水塘，現在的赤鱲角機場等等，都設在新界；在此問題上，中方佔了有利的條件，英國人也了解到這個重要因素，因此新界租約的問題，啓動了整個香港回歸的問題，中英談判從此開始。

一八九八年，英國佔領新界，遭到原居民的強烈抵抗，新界原居民用石頭、木頭與英國的洋槍大炮打，鬥爭之慘烈，有所謂六日之戰，表現出原居民的愛國情操。

新界原居民的土地本是私人擁有的永久業權，是清朝批下來的俗稱沙紙契。英國人佔領新界後，把所有私人永久業權的土地收爲英國皇家土地，稱爲集體官批，即是租約。英國人這樣做是強行剝奪了原居民的權益。魯平說，要爲原居民說句公道話，他認爲，香港新界原居民不是享有特權，是他們原來應有的權益，應受到特區政府的保護。

從歷史上講，原居民一直支持回歸，在大埔建立了回歸塔，再說抗日戰爭，香港淪陷時，新界原居民參加了東江縱隊。原居民堅持抗日，在整個香港都已淪陷的時刻，實屬難能可貴，並不簡單，所以，新界原居民是向來愛國的。爲了保留原居民的傳統權益，中國與英國成立專題小組，通過談判，產生了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二。

魯平代表中方直接與英國交涉，而與英國人打交道時，劉皇發給了很多協助。一般人表面上認爲新界原居民有特權，其實是英國人把他們全權擁有的私有土地，剝奪成爲英國皇家土地；作爲一種懷柔手段，港英政府保留了原居民的一部分傳統權益。回歸後，原居民的傳統權益理應繼續受到特區政府的保護，合情合理的寫入了基本法第四十條，其中包括丁屋，丁屋是原居民爭取來的，不是英國人賜予的，基本法起草時，有某些人因爲不了解而反對，劉皇發在文匯報寫了一篇《原居民的傳統權益與歷史淵源》，大家看了之後，於是都同意要寫入基本法。

後來劉皇發代表新界原居民參與基本法的起草、特別行政區的預委會和籌委會，擔任了港事顧問。通過長期的交往，彼此建立起了友誼，魯平認爲劉皇發是一位正義的人，因爲有情有義，所以新界原居民擁護他，得到新界人的支持，同時也是一位愛國愛港人士，這種情操從不動搖，是值得信任的朋友，有豐富經驗的顧問，令魯平得益很多。

在那麼一個大時代裡，魯平爲國家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他像一棵歷經滄桑老樹上的黃葉終於飄然而落。我將這片黃葉拾起，嵌上記憶的鏡框，他，終是我們集體緬懷的人物……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一日魯平與作者　　（攝於魯平家中）

身懷四技焦菊隱

鄭延國

人與事

幅員遼闊、人才輩出的中華沃土之上，只要一提及「戲劇」，便立馬會有人想到一九〇五年生人焦菊隱。焦先生的四項絕技，恰巧就是從這戲劇二字衍生而來。首先是導演戲劇，其次是編寫戲劇，再次是創造戲劇理論，復次是進行戲劇翻譯。

郭沫若的《蔡文姬》、老舍的《茶館》是他導演的，田漢的《關漢卿》、夏衍的《上海屋簷下》是他導演的，就連歐陽予倩的《桃花扇》也是他導演的。所有這些都是海內外赫赫有名的戲劇啊。沒有過人的技藝，焉能做到如此。

焦菊隱不僅能導演戲劇，而且還能編寫戲劇。譬如他曾將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茱麗葉》改編成京劇《鑄情記》，並於一九四八年在時稱北平的北京隆重上演。該劇由年長焦菊隱八歲的另一位戲劇家翁偶虹導演。劇中主要人物羅密歐、茱麗葉，分別由北平戲劇館的王金璐、高玉倩、張玉英扮演。催人淚下的故事情節，悲切哀婉的人物道白，在觀衆中產生了極大的反響。翁先生晚年曾深情地回憶說，焦菊隱改編的這個劇本不僅「融化了歌劇話劇的特點，成功地表現了人物的新姿態」，而且爲「京劇注入了新的血液」。

焦菊隱創造的戲劇理論主要體現在這樣三個方面。第一，戲劇導演必須將自己的創造性與劇作家的創作動機相結合，以求徹底傳達劇本底蘊。第二，戲劇導演必須將西方表演體系與中國戲劇特點相結合，從而爲演員提供切實可行的創作角色方法。第三，戲劇導演必須將傳統詩學與現代戲劇理念相結合，形成戲劇民族化的美學原則，比如，由形似轉入神似原則，以少勝多原則，以動帶靜原則等等。

焦先生的第四項絕活便是戲劇翻譯。他十七歲那年開始翻譯外國文學作品，在孫伏園主編的《晨報副刊》上發表。十九歲那年又轉向翻譯外國戲劇。爾後就讀於燕京大學並留學比利時、英吉利、法蘭西諸國，獲得巴黎大學博士學位。從此常常以嫻熟的英法兩種語言功夫馳騁於西方戲劇文學園地，將莫里哀的《僞君子》、左拉的《娜娜》、契訶夫的《櫻桃園》等著名戲劇移譯爲中文，且以「譯文的獨特風格和對作家、作品的研究、介紹，贏得了廣大讀者的普遍歡迎」。

在長期的伏案耕耘中，焦菊隱漸漸悟出了翻譯的奧秘，進而擴展爲一項項的理念。比如，「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文字，可以意譯；文學作品，就不能不直譯」。理由是意譯「把原作的作風精神一概喪盡，雖然直譯也一樣的喪失，畢竟多少還能有一些痕跡」。又比如，「將外國文學譯爲中文，給不會外國文的讀者看，就不能不造出一種稍微歐化的句子來，以維持原作的風味」。再比如，戲劇翻譯不同於其他文學作品翻譯，因爲「要搬到中國舞台上來演」，便只能「改譯（adaptation），而且改譯「於中國戲劇的前途實在是有絕大的幫助」。其中用改譯的策略進行戲劇翻譯的理念予人啓迪最大。

我曾拜讀過焦菊隱所譯契訶夫的劇本《依凡諾夫》，深感劇中一句句的譯文無不顯露出「改譯」的技巧。不妨拈出裡面的一段道白以爲佐證：「這是我對你的忠告：讓你的頭腦冷靜一下！像別人那樣，把事情看得簡單一點！人世間一切事情都是簡單的。天花板是白的，靴子是黑的，糖是甜的。你愛薩沙，她也愛你。如果你愛她，你就留下；你不愛她，你就走；咱們用不着小題大做。嘿，這夠多麼簡單哪！」沒有歐化的句子，沒有冗餘的詞語；每句話都乾淨利落，每個詞都清澈明朗，非常適合演員表達。

相傳一九七九年，戲劇表演家于是之，曾以濃墨在一方白布上寫了十個擘窠大字，用以深切緬懷一九七五年辭世的焦菊隱。十個字爲「先生先去也，一戲一豐碑」。今觀焦菊隱生前所導的每一劇，所編的每一劇，所譯的每一劇，乃至在其戲劇理論影響下所演的每一劇，情形莫不如是矣！

大師買低價書

陸琴華

文化經緯

魯迅從日本留學回來，於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開始在北京工作，長達十五年之久。在這十五年裡，有一件鮮爲人知的事就是魯迅愛買低價書。

魯迅在一九一三年十月五日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往本立堂問所訂書，大半成就。見《嵊縣志》一部，附《�originally錄》，共十四冊，以銀二元買之，令換面葉重訂。」原來日記裡寫的《嵊縣志》和附《郘錄》十四冊，是魯迅那天從北京琉璃廠的立本堂用兩塊銀元買來的。書雖然舊，甚至有些破損，需要重新修繕裝訂才可以閱讀，仍然可知這兩種書價格低廉，是非常便宜的。又如魯迅在北京琉璃廠的宏道堂一個姓程的書店老闆那兒，花七元，即七個大洋購到一部二十二冊的《潮海樓叢書》。花二十二元購到一部三十二冊的《佩文齋書畫譜》。一九一三年魯迅回家鄉紹興，路過紹興奎元堂，發現一部毛晉汲古閣的《六十種曲》一書，這本書是魯迅嚮往已久的書，魯迅也不討價還價，當即就買了下來。儘管這本書售價是二十四元，可是在當時也算是最便宜的一本書了。小地攤生意紅火的不多，大都冷冷清清。魯迅也會到小地攤上買低價書。譬如他在一九二三年舊曆年正月初六日記裡寫道：「又在小攤上得《明僮喝錄》一本，價一角。」街頭小地攤大都無人問津，卻也能給魯迅帶來驚喜。

魯迅在北京的十五年時間裡，有些書價高得驚人，令一般購書者望塵莫及。譬如現代藏書家傅增湘在一九一八年曾用一千四百元購過一百卷二十四冊的北宋本《樂府詩集》。替王叔魯，即一九三七年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首腦之一的王克敏購過宋版的《後漢書》，據說這套《後漢書》還屬於殘本，才四十九卷，可仍是花了一千五百元。再如庚子之亂以後，《永樂大典》散佚，清末琉璃廠的文友堂就開始以每冊現金一百元的價格舉國上下進行收購。有一個叫吳因之的人，他的家裡有兩本。據說一本是完好無損，一本是殘缺不齊。吳因之去世以後，他的後人就將這兩本書以五千元的高價賣出，其中內容齊全的那本賣了三千元，內容殘缺不齊的賣了二千元。

對此，魯迅感慨頗多，他在《買〈小學大全〉記》一文裡說：「線裝書眞是買不起了。乾隆時候刻本的價錢幾乎等於那時的宋本。明版小說，是五四運動以後飛漲的。從今年起，紅運怕要輪到小品文身上去了。至於清朝禁書，則民主革命後就是寶貝，即使並無足觀的著作，也常要百餘元至數十元。」由於書價大漲，或者說有些書價格過高，對於嗜書如命的魯迅來說簡直不堪重負。就是這樣，魯迅在北京的十五年時間裡通過省吃儉用，還是用近四千元來買書。

當然了，魯迅所買的這些書大都是無人過問的書。這些書不是人家論斤來賣，就是把書堆起來用一手杖高打價來賣。這些書十分便宜，不值什麼錢，是地地道道的低價書。

張居正現身教子

華今

文史叢譚

張居正安徽鳳陽人，明朝首輔。六個兒子中的三子張懋修很不省事。張居正在他的《示季子懋修書》裡描述：「乃自癸酉科舉之後，忽染一種狂氣，不量力而慕古，好矜己而自足。」

張懋修自幼聰慧異常，老早就知道寫作的一些門徑，引來了一些人的嘖嘖稱奇。張居正呢？也曾暗自得意，認爲三子張懋修是一匹千里馬，將來肯定前程似錦，一片光明。誰知兩次科考都不盡人意，自此張懋修陷入了痛苦的深淵。張居正看在眼裡，急在心上。如何讓張懋修重振旗鼓，喚起科考的信心和勇氣呢？張居正就用自己親身經歷來教育和感化三子張懋修。

張居正在給張懋修《示季子懋修書》的信裡說：「乃其所造爾爾，是必志騖於高遠，而力疲於兼涉，所謂之楚而北行也！欲圖進取，豈不難哉！」張居正認爲，治學和做事情都得嚴格要求，一絲不苟，腳踏實地，量力而行，低調做學問和做人，而一味好高騖遠，做些不切合實際的事，學問肯定不可能有大的收穫，走彎路，摔跟頭是自然的。原來張居正自幼就有「神童」「才子」等之譽。一次，爺爺張鎮跟張居正說話，當時聲音很大，驚得窗外樹上的蟬蟲呼地一聲飛跑了。爺爺張鎮借題發揮，告誡張居正：「孩子，知了知了，做學問不可能一知就了。」張居正點點頭，就把爺爺張鎮的這一番話編成一副對聯，這對聯：「學問學問，必須既學又問；知了知了，不可一知就了。」爺爺知道了，再一次告誡張居正，來了個上聯：「莫做燈籠千隻眼。」張居正靈機一動，吟出下聯：「要當蠟燭一條心。」對得工整，天衣無縫。張居正自此開始沾沾自喜，驕傲起來，招來一些人圍攻，吃了不少苦頭。於是張居正認爲三子張懋修科舉失利，對於打壓一下張懋修的傲氣或許還不算是壞事，因爲此前的張懋修太順利了。而張居正就被一些有識之士打壓過。

據說張居正十三歲的時候，從荊州到武昌參加舉人考試。張居正考中了，但是沒有被錄取。刑部尚書顧璘對監試的馮御史說：「張居正是一個大才，早些發達，原沒有什麼不可，不過最好還是讓他遲幾年，等到才具老練了，將來的發展更是沒有限量。」等到嘉靖十九年，張居正十六歲了，再次參加鄉試，考中了，他才被錄取爲舉人。後來，顧璘對張居正說：「古人都說大器晚成，那是中材說法罷了。當然，你不是一個中材。上次我對馮御史的囑咐，竟耽誤了你三年，這是我的錯。但是我希望你要有遠大的抱負，要做伊尹、做顏淵，不要只做一個年少成名的秀才。」張居正又以自己這段親身經歷來教育三子張懋修。譬如丙子年春天，張懋修的幾個兄長都執意要張懋修參加科舉，張居正曾堅決反對，但張居正架不住人們勸說，到最後只好同意張懋修參加科舉。張懋修科舉失利既在意料之內，又在意料之外。張居正對當時一蹶不振自暴自棄的張懋修說：「固望汝等繼志繩武，益加光大，與伊巫之儔，並垂史冊耳！」愛情常遇暴風雨，人生難免不如意。一帆風順的人生實在少之又少，張居正希望張懋修能像他那樣以伊尹、巫咸爲榜樣，將其精神道德發揚光大。而自我誇耀，出人頭地等這些短視行爲實在不是他本人意願，因科場失利一蹶不振更不是張居正所希望的。

張居正現身教育果然奏效，張懋修開始把父親作爲一面鏡子，很快擺脫了困境，萬曆八年，也就是一五八〇年，中了頭名狀元。